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 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 胡美 刘鸿武

〔关键词〕对外援助、中非关系、南南合作

〔提要〕中非合作是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成长与提升的实践舞台。借助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这一战略支点，中国实践和体验着南南合作及其理念的成长嬗变。五十六年的中国援非体现了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从单方面强调非洲政治解放与民族独立到观照中非双方共同发展的变迁；利益观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的转变；合作关系从互援互助到相互合作的演进；身份建构则从反帝反殖的革命共同体到南方国家发展事业的发展伙伴的嬗变。中国的南南合作理念伴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而不断成长，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外交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

〔中图分类号〕D82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12) 1期0012-17

〔完稿日期〕2011年11月7日

〔作者简介〕胡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南方国家的一员，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

* 本文为胡美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特色国际援助之理论总结与实践创新》(课题编号: 11CGJ022)以及刘鸿武主持的200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09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在此过程中，非洲虽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其南方国家身份所赋予的发展使命使其逐渐成为中国推进南南合作的战略伙伴，对非关系成为中国探索南南外交的独特窗口。总体上看，五十多年的对非援助与合作实践是中国外交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也是中国南南合作理念不断充实完善的成长过程。随着中国援非的深入，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观、利益观、合作关系和身份建构突破和超出了南北合作的范畴，而具有塑造现代世界体系的更深刻的时代意义。认识总结这份当代中国外交的特殊实践，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与思维框架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观： 从非洲民族解放到中非共同发展

发展是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也是南南合作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围绕着探索南方世界发展道路的命题，南方国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国援非体现了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从政治领域到政治经济领域并重演变，从单方面强调非洲的发展到观照中非双方共同发展的演变。

中国对非南南合作的起点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的。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相同的反帝反殖反霸使命赋予了中非双方政治上的“革命者”、秩序上的“挑战者”的角色，相同的历史际遇使中国获得了与非洲共同变革旧秩序的勇气和动力，坚定地支持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把亚非拉国家视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强调对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持。^[1]围绕着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排除万难，展开了对非洲国家的全力支持。基于坦赞铁路对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本国经济需要巨大资金支援和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做出了斥巨资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定。周恩来曾指出，“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00-601页。

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2]显然，在中国领导人的援助视野中，非洲的政治发展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是整个南部非洲甚至全体非洲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南南合作的领域超越了一国一地的合作范畴，而具有了南方国家共同谋求民族解放的鲜明特色。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曾讲的一句话为这一时期的南南合作做了最好的注脚——“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3]

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援非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中国政策的这一调整耦合了阿明所理解的非殖民化思路。阿明曾这样表示，“实现亚非政治的非殖民化”只是南方国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而赢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4]由此，中国南南合作的内涵向民族解放和经济合作并重的方向转变。中国在继续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提供政治上的支援外，还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恢复经济。据统计，1956—1977年间，中国为非洲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5]虽然巨额的援助提供给不同的非洲国家，这些援助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即均围绕着非洲国家的发展而展开，展示出其不同于传统援助的特色。1963年周恩来访非期间，首次公布了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即“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6]较为系统全面地给出了中国发展观的官方诠释：“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的政府增加收入，积累资金”。中国一改传统援助者对非洲的灰心失望，字里行间浸润着对非洲未来发展的希望和信心，其本身就是对非洲走上自力更生道路的巨大暗示和鼓舞。

[2] 尹家民：《援建坦赞铁路内幕》，《党史博览》，1999年第12期，第10页。

[3] 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第19页。

[4] 萨米尔·阿明：《南南合作走向复兴（上）》，《读书》，2005年第11期，第32页。

[5]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4页。

[6] 本文涉及的“八项原则”的具体条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31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中国和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富有变革意义的结构性调整，这一大的世界背景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理念重构的起点。而此时的非洲也正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在经历了1970年代非洲经济的衰退后，1980年代西方开始主导在非洲实行全面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非洲大陆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探索属于非洲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适合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途成为了中非双方的共同主题和追求，也成为中非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关系摆脱了非洲与传统殖民者之间的依附和不平等关系的束缚和困扰，成为发展中南方国家共同谋求经济发展时代进步的重要选择。虽然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摆脱困境、走向腾飞的前兆，但中国政府坚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并将之作为“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7]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1983年，中国政府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实施援外项目。

“四项原则”的提出，不仅是中国援外方针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念的重大转折。在新的援外原则中，中国不再单方面强调非洲国家的发展，发展的聚焦点也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解放，转而强调中国和非洲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四项原则”明确指出，“合作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取长补短”，还是“互相帮助”，均以承认和认可非洲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势和长处为前提，这些既是非洲未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非在合作中有效互动、成功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共同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援非观念的巨大进步，突破单向促进非洲发展的局限，在双向互动的经济框架下拓展了南南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展示了新型南南合作超越传统南南合作的新内涵和意义，是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的一次飞跃性进步。

随着中非共同发展援助观念的推广，在发展的表达方式和表现载体上，南南合作也拥有了更宽广的表现领域和更多维的表现舞台。2000年，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开辟了“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合作的机制化平

[7] 胡耀邦：《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1月14日。

台。目前论坛已经涉及世界1/3的人口，不仅给中国和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合作平台，而且为中非合作领域的拓展、层次的提升以及合作的结构转型提供了框架性保障。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合作论坛”成为中国和诸多南方国家实现发展的一个重要品牌，印度、巴西、韩国等国也先后开拓这一方式发展对非合作，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共同发展不仅仅只是中国政府的设想和政策，而且是众多非洲国家的追求和梦想。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对非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表示“向东看”。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对到访的胡锦涛主席表示，“当你们引领世界发展时，我们想紧紧跟随你们的脚步”。^[8]

在中非合作的带动下，中非商贸往来日益繁荣，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也已成为中国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068亿美元，2010年，中非贸易逆全球金融危机而继续上涨到1269亿美元。^[9]西方有批评指出，在中非贸易中，中国进口的商品额低于非洲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额，中国有向非洲倾销产品之嫌。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在经过实证分析后指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不大：过去10年间，进口额在出口额的65%至105%之间”。^[10]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与非洲在发展节奏上的盲视，所以造成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发展节奏和发展需求来安排对非援助。^[11]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尼·卡尔森甚至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邪恶的经济竞争对手，没有任何道德可言。”^[12]实际上，在中非合作中，中国不仅在努力地为中国企业打开非洲的大门，而且也将精力放在为非洲企业引入中国市场。2006年，根据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对资金的需求，中国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协助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同时，根据非洲商品走进中国市场的需

[8] Declaration made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his entourage during their visit to Nigeria, SCMP, 28 April, 2006.

[9] 《2010年我与西亚非洲国家贸易统计国别情况》，2011年6月13日，<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date/201106/20110607596690.html>.

[10] 瓦伦丁娜·罗梅伊 巴尼·乔普森，《中非贸易的数字背后》，2010年12月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128>.

[11] C Alden, D Large,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5.

[12] Wikileaks: *US Monitors "Aggressive" China in Africa*, 9 December 2010,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1955516>.

求和现状，中国在义乌开办“非洲商品展销中心”，由中国政府出面帮助非洲商品打开中国市场。通过这一平台，非洲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加快。现在埃及的柑橘、南非的葡萄酒、加纳的可可豆、乌干达的咖啡、突尼斯的橄榄油等特色产品，逐渐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和喜爱。为支持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2005年起，中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截至2010年7月，受惠商品已扩大到4700多个税目，到2015年将开放95%的非洲商品关税。据统计，从2005年至2010年6月底，中国在零关税待遇下累计进口非洲商品13.2亿美元。^[13]

二、中国南南合作的利益观：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

利益是任何合作的目的和归宿。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大师摩根索甚至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目标都是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14] 国家主体、利益至上和权力追求是现实主义国际援助理论的核心。中国对非援助大致经历了从无偿援助为主到多种援助方式并存的转变，利益追求也经历了由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以无偿援助为主。在国际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援非强调尽力而为，不求回报。鉴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掠夺，经济落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该时期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援建一些解决生活基本需要的项目，帮助非洲国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八项原则”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为国际主义做出更大贡献。”^[15] 由此可见，中国的援非更多地是从非洲方面着眼考虑的，较少考虑中国自身在援助中的经济回报。对此，不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中国对我们的援助是无私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4]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6, No.2, June 1962, p.308.

[15]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2日。

的，卓有成效的。”^[16]

事实上，不求回报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回报。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没有附加任何政治目的的援助，却赢得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给予的坚定支持。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场争取重返联合国的马拉松中，非洲国家坚持了十多年的斗争，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最终，在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76票中，非洲国家给予了不可或缺的26票。

然而，长时间大规模的无偿援助给亟待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到1970年代，不求回报的无偿援助激情还没有完全消退，但随着援助数量的增多和援助规模的扩大，维持这种热情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正在明显削弱。在这一阶段过程中，由于沉重的援外负担，加上一系列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中国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援外支出的比例，由“一五”、“二五”期间的1%左右，提高到1972、1973、1974年的6.7%、7.2%、6.3%，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1975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这一时期援外规模的确过大，巨额的外援导致中国的经济张力的结构性失衡，直接影响到中非援助关系的弹性。南南合作在利益结构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陷入了困境。

为了保持中非援助关系的可持续推进，中非双方都不得不过头来重新思考这种援助中的深层次缺陷，并开始探索一种兼顾中非双方经济和发展利益的援助模式，让双方在援助与合作中均有所收益。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行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新兴援助方式的探索，开拓性地探索一种“互利”的合作模式。1983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中央援非政策的调整表明，中非援助关系中的利益结构由“不求回报”向“互利”、“讲求实效”过渡。南南合作走出了单方面的无私奉献，而开启了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共同谋求发展利益的新航程。

对于中非援助与合作关系的目标获益，中非双方有了新的认知和期待。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最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努力发现并践行一种以共同发展为本

[16]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位的全新的生存文化与价值理念。在处理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问题上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17]这种包容了市场力量的经济因素进入对外援助领域，中国企业参与援非的过程，在完成援助使命的同时，还带动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步伐。

互利共赢原则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其发展能量，也正是因为其瞬间释放的影响，让很多传统援助国对中国在非洲持高度怀疑的态度。在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中非资源合作领域，中国屡屡被批评为“掠夺”非洲资源。然而，中国并不是非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消费者。资料显示，欧洲和美国依然是非洲石油的主要消费者，占到33-36%，中国大约进口了非洲石油资源的10-16%。^[18]在石油开采行业，中国在非石油公司开采量所占份额也相当有限。2006年，所有在非中国公司的石油产量大约只相当于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国际公司在非产量的1/3。^[19]与欧美大国做法不同的是，中国在开采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同时，高度关注和重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增多，从2001-2003年的年均5亿美元，增加到2004-2005年的年均15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70亿美元。^[20]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到非洲的水电站和铁路建设上。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已经至少提供了33亿美元用于建设水电站项目，超过600亿瓦的发电量。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30%的供电量。^[21]中国目前至少已在35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900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援助，中国的“安哥拉模式”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典型模式。对于基础设施极度缺乏的非洲而言，这些都将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对于中国和非洲的这种共赢模式，非洲国家表示欢迎和赞许。几内亚总统阿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8] Vivien Foster etc,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orld Bank, 2009; Zong He, "Some Responses to the 'China Threat in Africa,'" *China Daily*, November 7, 2007.

[19] James Swan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African Affairs", June 4, 2008, <http://foreign.senate.gov/testimony/2008/SwanTestimony080604a.pdf>>.

[20] Vivien Foster etc,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orld Bank, 2009, p.vii.

[21] Vivien Foster etc,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orld Bank, 2009, p.viii.

尔法·孔戴明确表示，中国和几内亚之间并不如西方所言是用资源换资金，几内亚着眼与中国的长远的强劲的伙伴关系，“和中国之间是双赢关系。”^[22]

无论是不求回报还是互利双赢，都是中国南南合作谋求南方国家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对于合作的利益需要和分配的心理期待。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双赢，南南合作超越了一种单向度的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支配和占有关系，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相互设定、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关系。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双赢，没有损害到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中的收益，反而增加了非洲国家作为合作方在合作关系中的互动与共荣，充分地调动起本土经济中与生俱来的优势和长处，并在合作中激发并充分释放出来。随着南南合作的深化，合作的南方国家之间各国利益的一致性、互联性明显增强，正在日益构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存在、共同发展的整体，互利双赢成为推动这一“俱荣俱损”关系继续前进的动力。

三、中国南南合作的合作关系观： 从互相援助到相互合作

中国的援非实际上是中国和非洲围绕着发展主题而展开的互动与合作。中国突破了传统援助的赐予观念，打破了既定的援助结构图式，观察援助关系的视角不再仅仅停留在援助者层面，也延伸到受援者的维度，在援非中强调援受双方的互为主体和互为客体的角色转换。因而，中非关系超越了施援与受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从强调援助到强调合作，中非关系从相互扶持、平等互助的互相援助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相互合作转变。

作为一个传统受援者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受援体验和发展经验为中国的援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中国在援非中自始至终坚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动力源于其自身，主张以非洲国家为主体展开援助，因而强调和倡导一种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互为主体的援助关系。在1964年的“八项援助”中，中国政府就明确了中非相互援助的关系。“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

[22] “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2011年9月1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725?page=1>.

的”。作为援助者，中国在援非中没有了传统援助者所特有的盛气凌人和居高临下，代之以相互尊重的平常心。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都得益于这种相互援助的合作关系结构。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23]

既然援助是相互的，援受双方在权利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恰恰是这种平等成为了中非平等交往的基础。在博茨瓦纳总统菲斯特斯·摩格（Festus Mogae）看来，中国的援助已经摆脱了传统援助中的恩赐与等级，而形成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我发现中国人对待我们是平等的。西方对待我们像他们的子民。”^[24]与南北援助不同，南南援助的优势并不在于充裕的资金和多样化的现代合作技术，而恰恰在于南方国家在发展中发展动力源于南方国家内部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而形成的平等交往原则。这种平等交往表现在处理与受援国的关系上，则表现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援受双方的平等交往则表现为“不干涉他国内政”。正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25]在这种援助关系中，不仅非洲的本土知识和发展需求得到了充分尊重和重视，而且非洲自身也逐渐地从一个被任意想象和建构的客体转变为一个被尊重、被认同的发展主体。

在南北援助关系中，传统的北方援助国总是试图在对非援助中附加种种条件，其中最为典型的即为“民主”和“良治”，试图在非洲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制度。与此相反，中非合作中，中国政府始终主张在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非洲国家在发展中参考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但鼓励“非洲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6]对此，西方国家对于

[23]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24] G. Price. *India's official humanitarian aid programme*,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background paper.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p.9.

[25]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26] “温家宝出席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2009年11月9日，http://www.gov.cn/ldhd/2009-11/09/content_1459608.htm.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颇有微词，认为这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将助长非洲的腐败，不利于非洲发展。美国长期从事中国援非问题研究的学者黛博拉研究后发现，中国组织援助的商务部是通过竞标的方式来确定提供援非物资的中国公司的。除了极少赠予部分的援助以现金结算外，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将现金转账到非洲国家手中。“钱留在中国，支付给中国公司和非洲国家政府授权的供应商，实际上援助防止了大规模的营私。”^[27]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肯定中国援助模式的长处，塞内加尔总统甚至表示，“连西方自己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28]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援外方针继续调整，中非之间平等互助的对等援助关系为中非建构起“共济互助”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互相援助逐渐为相互间的平衡合作所取代。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非双方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有待提升，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补益和互惠的空间，在此长彼短的领域有形成优势互补的可能。诚如一位非裔经济学家所说，“他们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有他们所需的。”^[29]从这种意义上，中非双方在资源、技术、农业、教育等此长彼短的领域构建起无数的利益交汇点，拓展出众多合作与共赢的空间，在很多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合作。

从援助到合作的转变，不单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还伴随着中非之间合作角度和技术渗透方式的变革。在合作关系中，双方的援助互动关系为合作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所取代。较之于援助，合作有助于合作者走向更加深入的合作。中非合作为非洲发展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为中非双方的技术交流和技术人员培训创造了可能性空间。在中国—苏丹石油技术合作下，苏丹已实现由一个石油产品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转变，拥有了集石油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能力。英荷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开采了50多年的石油，尼至今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没有石油生产和加工体系。正如一位非洲官员指出的，西方的技术虽然先进，但“西方国家从未

[27] D. Bräutigam,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http://africabusiness.com/2010/11/25/china-africa-and-the-international-aid-architecture-2/>.

[28] Abdoulaye Wade, "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ce What is Preach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08.

[29] 丹比萨·莫约著，王涛、杨惠等译：《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打算转让技术……但中国却愿意转让。”^[30] 中国的技术发展基础和现状也更适合非洲国家的国情，因而合作获得更好的效果。爱立信和摩托罗拉垄断非洲通讯业时，非洲的通讯业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当中国的华为等通讯企业与非洲合作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究其原因，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谢伯阳表示，中国的“低成本发展之路，比西方模式更适合非洲”。^[31]

在合作中，合作双方的发展需求得以重视和尊重，因而合作能够达成；合作双方在合作中实现了其发展的预期目标，因而合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至今，中非根据持续变化的外在国际环境和内在发展优势，不断地发现和拓展彼此间合作的领域和空间，针对双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期待，创新合作载体，适时调适合作的内容和重点，找寻更适合双方合作和发展的新增长点，高质量地满足双方对于合作的心理预期。伴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中非合作领域日益拓展，金融、旅游、航空、环境保护等逐渐成为了中非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亮点。以中非金融合作为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业务已遍及非洲大陆。截至2009年底，埃及、摩洛哥、喀麦隆、南非和尼日利亚等5个非洲国家的6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32] 中非金融合作的开展将大大便利中非合作的全面拓展。

双方的合作关系建构了合作，同时也被合作所建构。中非合作成功的经验成为中非合作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和基础，而中非合作中的障碍和问题，也成为中非间不断合作创新的新契机。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的扩大，中国大量涌入南非市场的纺织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非的一大支柱产业纺织业造成了严重冲击。针对这种情况，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南非时承诺，中国将主动限制出口到南非市场上的服装和纺织品数量。而此前没有任何国家同非洲主动签订类似的单边优惠贸易协定。^[33] 中南合作关系在建构中南之

[30] “Friend or Forager?” *FT*, 23 Feb, 2006; “The Chinese are in Africa – This Time to Stay”, *New Era* (Namibia), 13 Mar 2006.

[31] “中国低成本发展之路更适合非洲”，2010年5月3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00531/n272456914.shtml>.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33] Gordon Bell, “Deals see Wen turn on charm in Africa”, *The Standard*, June 23, 2006.

间的纺织品贸易，而中南纺织品贸易业在推进中南关系继续向前推进。

正是由于中非双方在合作中的相互建构关系，因而，五十六年的援助与合作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而是一个不断完善优化的开放的合作体系。中非合作的成功经验会成为中非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中非之间对于合作的更高期待，也成为推动双方深化合作的动力。在中非之间的南南合作中，中非对于合作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殖民关系，而具有了发展视域下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实现深度交流和融合的特点。

四、中国南南合作的身份建构： 从政治同行者到发展追求者

身份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实践，是赖以处理与外界关系的自我定位系统。亨廷顿认为，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34] 社会心理学者则认为，身份实际上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他或她是谁的定义，包括个人属性和共同属性。”^[35] 中非南南合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和非洲在交往中不断地构建其身份相互认同的过程。五十六年的中国援非，中非的身份从一个共同应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同行者向共同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者嬗变，在这一嬗变历程中，中非的平等身份却始终没有改变。

对正在谋求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的身份。殖民时代，作为殖民地的非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颠覆性的身份危机。而通过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相似历史记忆、刚刚完成民族独立的国家交往，非洲逐渐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中非共同的殖民记忆内化为其反帝反殖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它们在对抗当时国际秩序的强者的过程中，联合起来，形成超民族政治共同体。凭借着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同样的殖民历史和民族抗争记忆，提高了双方分享共同命运的程度。为了谋求在相反于既有主流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中非两大政治共同体超越了时空，依托援助这一载体，筑就了共同的反帝反殖战壕，建构起一种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拥有了共同的身份。

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在巩固非洲民族独立的相当长时间里，中非交往因为共同应对相同的权力中心，超越了与西方构成的强暴性的认同关

[34]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35] 巴伦·伯恩：《社会心理学》（第十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系，强化着一种基于共同身份而产生的强烈认同。1956年7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英法控股96%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引发“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不能坐视埃及的主权和领土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犯，“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物资援助在内，支援埃及的斗争。”^[36]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依然很小，不可能给予很大的物质援助，因此，这种支持与其是一种坚强的物质支持，还不如说是一种坚定的精神鼓舞。中国所给予非洲的力量来源，与其说是物资援助的物资所带来的战斗力，还不如说是中国反殖反帝身份赐予非洲的精神鼓舞和认同支持。埃及驻华大使加拉卜大力称赞中国的援助是巨大而慷慨的，“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侵略者的时期和巩固中埃两国友好关系上起了巨大影响。”^[37]中国被非洲国家“抬进了”联合国后，中国代表团每届联合国大会都在为非洲的反殖斗争伸张正义。

中国在对非援助时，根据“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八项原则”的精神，“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援非专家通过这一方式践行其与非洲国家专家相平等的身份，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受援国及其人民的一种态度和身份，这种态度也影响着援助的效果。正如美国学者黛博拉所注意到的那样，与中国援助者完全不同，“大部分西方援助工人享受的高工资是当地人民痛苦的一个来源。”因此，她提醒人们在观察和评价中国的援非专家时，记住这些对比非常必要。^[38]

随着非洲民族独立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中非人民首要的、全新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新的社会语境让中非合作建立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在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问题上，中国这一时期对非关系中的身份定位有所调整，即不再是一个同行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携程的发展伙伴，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共同追求者。

中国的国际地位伴随着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提升，然而，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没有改变。在“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指导方针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定位也没有改变。新时期的中非合作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非洲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中非关系反而被视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作为“中国有尊严

[36]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37]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231页。

[38]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7.

地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平台”。^[39] 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筹资会议上，胡锦涛明确表示：“中国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并提出五大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让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40] 在此后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西方传统援助国纷纷作出了撤资减援的举动，中国政府则明确承诺，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洲的援助，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非贸易与投资，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可持续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积极敦促国际社会切实履行过去所作的承诺，为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41] 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七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和裁员的企业。^[42] 在危机面前，在其他国家纷纷削减援非预算时，中国则继续践行援非承诺，一方面表现出中国与非洲共同担当发展危机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中国在危机中仍努力扮演好作为发展伙伴的角色的决心。

在实践亚非世界复兴和发展诉求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凭借着经济上的优异表现，中国逐渐具有了介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过渡性国家属性，逐渐摆脱了国际体系边缘的地位，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国一样成为了新兴经济体，从实力对比上为改变当前国际体系的固有运行模式作出贡献。“当前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成为一个（发展）榜样，而且开始重构国际发展、国际经济、国际社会甚至国际政治的图景。”^[43]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依然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由一个关注自身发展向更多地关注整个亚非世界发展的全球性国家转型，中非依然恪守着最初的共同的平等身份。2007年，胡锦涛在访非中强调，“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真诚相待的好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好兄

[39] 刘鸿武：《中非关系：撬动中非欧三方关系的一个支点》，<http://ias.zjnu.cn.academic/kyyy.asp?id=4>。

[40] 《五大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9月16日。

[41] 熊争艳、刘宏鹏：《中国不减反增对非援助提升其反经济危机能力》，2009年2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0/content_10854504.htm。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43]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i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4, p.3.

弟。”^[44]无论是朋友、伙伴还是兄弟，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中，都是褪去了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同辈人。这种身份的平等不只是体现在口头，还展示在中非正式的政策文件之中，2006年底公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将中非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阐释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45]这一内涵，除了身份的平等，互信、共赢和互鉴更展示了中非间身份的深层互动与全面交流。虽然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几经转型、中国具体的援非政策的几度调整，但这些都未改变中国在与非洲国家交往的平等、谦卑的姿态。

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非合作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视野内的国际合作事业。如何以南方国家的身份、南南合作的标准实践国际化合作，是当前南南合作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如目前引起国际热议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非洲的环境问题以及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企业带着自己的标准走进非洲，以中国的标准和中国的表达方式在非洲执行其劳工和环境标准、履行其社会责任。然而，这种标准和表达方式也许并不符合非洲国家的习惯和国际惯例，因而，中国的公司频频被西方国家指控。在这一点上，目前，中国政府正着手采取一些措施，以期逐步解决相关问题。中国环境规划院已经起草了针对涉及援助和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的环境指导方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承诺运用“对受其益的公司，采用最高的社会和环境的标准”。^[46]200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升级了其《环境保护政策》，坚持中央政府倡导的“绿色信贷”政策。中国在非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惠及当地民众。在苏丹，中国企业的公益事业已使200多万人受益，在尼日利亚捐建的中尼友好小学缓解了当地300个村庄的基础教育压力。^[47]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种种行动表明，中方已经意识到南南合作中所涉及到的种种社会和国际责任等问题，并在积极行动，力争制定更高的标准规范在非企业的行为。然而，作为以南方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国在非公司和企业，除了要应付国际商业方面的挑战外，身份的国际转换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直

[44] 胡锦涛：《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2007年2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07/content_5711506.htm。

[45]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http://www.focac.org/chn/ltada/bjfhbjhy/hywj32009/t584776.htm>。

[46] Uwe Wissenbach, “Partners in Competition? The EU, Africa and China” Conference Summary Proceedings, European Union, June 28, 2007, p.7.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面的重要挑战。

结 语

经过60年艰苦奋斗,中国由一个穷困落后的衰败国家重振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并逐渐由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行列迈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始终将自己视为发展中的南方国家的一员,将自己的理想、情感、行为与目标都放置在南方国家的行列中予以把握。中国需要将自己的发展与促进亚非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为非洲大陆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五十六年的中国对非援助与合作历程见证和承载了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过程。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过程就是中非双方不断创新、保存和强化彼此对于南南合作的理解,是中非双方独特外交智慧的集体结晶,展示着中非双方对于南南合作的深刻理解和自我诠释。

56年的风云变化,南南合作的实质没有变化,而内涵却在不断深化和丰富。作为以发展为使命的南方国家,发展是其最终极的内在诉求和最崇高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援非实践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向中国以合作者的身份,与非洲国家围绕着互利双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最终实现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转变。伴随着中国援非进程的推进和中非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南南合作观念不断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在新的南南合作理念下,中国和非洲以全新的南方国家的身份和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南方世界的关系。通过南南合作,中非双方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开展长达56年的合作,创造了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在这一平等身份的引导下,中非双方的南方身份意识日益觉醒,逐渐建构起相互平等的南方国家身份,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北方国家享有相等身份地位的国际关系行为体。